乾隆与石鼓文

施安昌

内容提要　作者根据乾清宫旧藏石鼓文和相关的御制诗文，梳理出弘历传拓石鼓、考证鼓文和新编，重刻石鼓几件史事。说明他本人对石鼓怀有浓厚兴趣，奉之为“千秋法物”，同时他也从石鼓得到启发，一再阐明“述古兴贤”、“述古传今”、“重道崇文”的文治思想，并提出了保护、重刻和异地放置石鼓的具体办法。由此也推动了乾嘉考证学的发展。

关键词　石鼓文　乾隆　韩愈　国子监　重刻石鼓　述古兴贤　述古传今

在2011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《珍秘翰墨——清宫藏善本碑帖展》上有一件乾隆14年己巳(1749)拓的石鼓文拓本〔图一〕。就存字多少而言当然是在年代更早的拓本之下(今还有宋明拓本传世)，以往无缘展出，但就其历史价值而言有其他所不能相比之处。

石鼓为十块圆柱形巨石，每石高度约90厘米，直径约六67厘米(惟《作原》一鼓被凿去一截作臼)，形状若鼓〔图二、图三〕，每石用大篆体刻四言诗一首，典雅、高古。其中《吾车》一首诗句与《诗经·小雅》中《车攻》、《吉日》两首文句有相同，又有“天子永宁”、“公谓天子”等句。诗的内容记叙君王与贵族游猎，所以也称《猎碣》。关于它的制作年代，历来诸说不一。唐初出土于天兴县(今陕西凤翔)，自韦应物、韩愈作《石鼓歌》以称颂，而后显于世。经五代之乱曾散佚，宋代郑余庆迁凤翔府夫子庙。宋司马池复辇置府学之门庑下。宋大观(1107－1110)中自凤翔迁于汴京(今开封)辟雍，后入保和殿。金人破宋(1127)，辇归燕京(今北京)国子监。历元、明、清至民国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将石鼓迁藏四川。1951年再回北京，入藏故宫博物院至今。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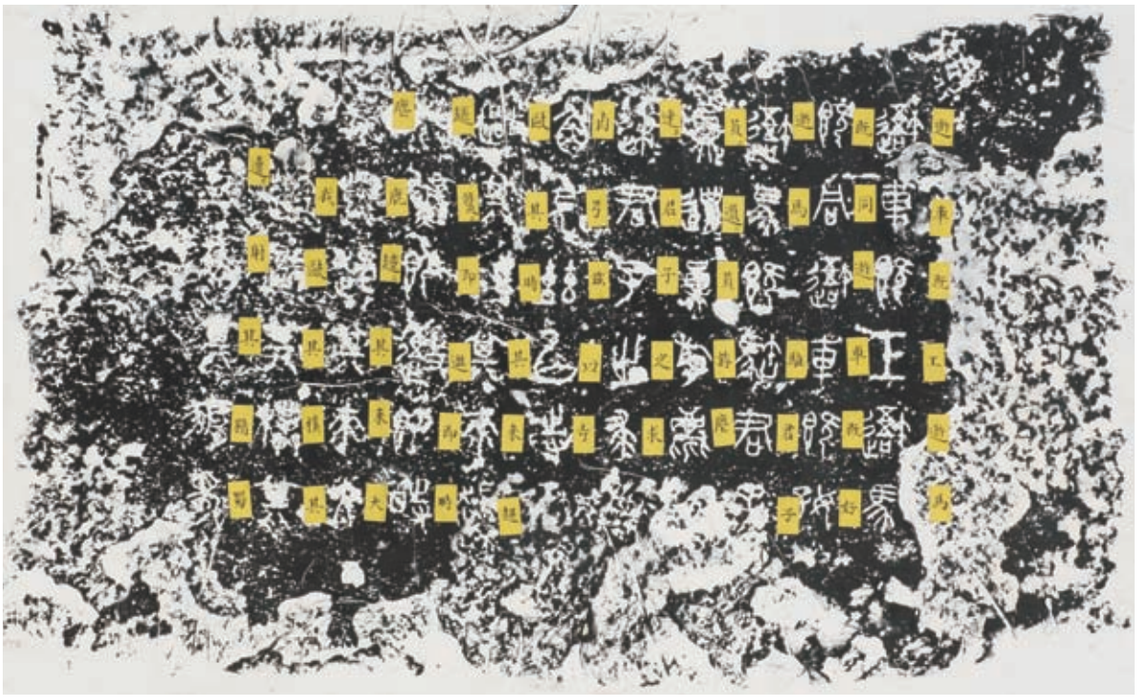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八年癸亥(1743)，弘历三十三岁，他命张照、梁诗正等将内府藏书画精品加以著录，编成《秘殿珠林》和《石渠宝笈》初编，前者为佛教艺术品。

乾隆十二年丁卯(1747)，又谕选内府所藏法书刻成《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》。

乾隆十四年己巳(1749)，弘历三十九岁，他对历史更为悠久、文字深奥的先秦石鼓发生了兴趣。石鼓陈列于国子监，元人潘迪撰写的《石鼓音训碑》和石鼓放在一起。弘历拓得石鼓文一份，参

书籍1.indb 148　12-5-31 下午4:49

〔图一〕乾隆十四年拓石鼓文之一《吾车》



〔图二〕石鼓之一《銮车》



〔图三〕石鼓之一《田车》



照“音训”，研读铭文。在每个字右边粘上一明黄纸签，标写出释文。便于以后反复诵读。还制作了一只精雕细刻的木匣来装入拓片。他作了一首诗叫《石鼓歌》，称石鼓是“千秋法物”[1]。然后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奉和一首，再把诗刻到木匣上(〔图四〕，见附录一)。从此，这套

‹1› 见《清高宗御制诗》第二集页150，木匣上并无《石鼓歌》之标题。

书籍1.indb 149 12-5-31 下午4:49

〔图四〕乾隆十四年石鼓文拓本木匣



石鼓拓片就一直供奉在乾清宫里，这里为皇帝听政的地方。

这年十一月，敕令梁诗正、蒋溥等对内府庋藏之鼎彝铜器绘图、著录、释文，编为《西清古鉴》。铜器与石鼓同属商周古物，弘历从石鼓文得到启示而决定整理内府藏器。“以游艺之余功，寄鉴古之远思，亦足称昇平雅尚。”(《西清古鉴》上谕)透露出同样的思想。

乾隆于文史和艺术本博学多能，涉足石鼓也不奇怪。然而这件事做得如此郑重其事，而且在许久以后的诗文里还一再回忆起来，那自然是另有深意的了。试从他和侍臣以及韩愈的诗里分析。因原诗都长，这里仅作摘录。

韩愈《石鼓歌》(摘)：[1]

张生手持石鼓文，劝我试作石鼓歌。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。
濯冠沐浴告祭酒，如此至宝存岂多。圣恩若许留太学，诸生讲解得切磋。

弘历《石鼓歌》(摘)：

石鼓之数符天干，千秋法物世已少。况乎辟雍所罗列，多士藉以资搜讨。
昌黎建议虽不行，至竟如言见诚蚤。韩意其然岂其然，吾愿兴贤得真宝。

‹1› 蘅塘退士编：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韩愈《石鼓歌》。

书籍1.indb 150 12-5-31 下午4:49

臣蒋溥诗(摘)

圣人真宝怀兴贤，考文亦冠籀篆篇。我皇武功廓八埏，撰刻不籍猎碣传。

臣介福诗(摘)

不惟其物惟其意，中兴伟烈尊周宣。我皇揽古振异彩，牟尼珠耀荣迴旋。

上述韩诗中祭酒是国子监主管。韩愈建议将石鼓自凤翔移长安太学终未实现。至宋徽宗时方移入汴京辟雍。弘历诗中"蚤"通"早"。"岂其然"意"岂止是这样"。

弘历《石鼓歌》表示"吾愿兴贤得真宝"，即借助于石鼓这一真宝，广纳天下贤士，鼓励"稽古右文"的风气。而臣子诗意更明朗："我皇揽古振异彩"，"中兴伟烈尊周宣"。很明显，弘历《石鼓歌》主旨在于对韩愈迁石鼓至太学正确建议的赞许，并由此获得"吾愿兴贤得真宝"的启示。韩愈"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"(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)。早在乾隆三年(1738)弘历就敕封韩愈三十四代孙韩法祖为翰林院五经博士，其后代子孙世袭其位。

二

乾隆三十七年壬辰(1772)上谕为修纂《四库全书》向各地征书。后又开四库馆。

乾隆四十八年癸卯(1783)仲春，弘历七十三岁，内府得到石鼓的元代拓本十叶，这在当时是石鼓文最早的拓本了。后面还附赵孟頫写的音释，抄录了唐张怀瓘赞语，韩愈、韦应物诗，宋苏轼、周越诗文，元代周伯琦、顾文昭、卢原质、孙经、唐志淳、危素的题跋与诗共六叶。弘历将元拓本与十四年拓本放在一起，每个鼓逐行逐字校对，并写下详细的校碑记录。如"乾隆己巳年摹拓石鼓文。第一鼓即元拓本第八鼓，第三行多'鹿'字，第六行多'遯'字，共多二字(下略)"。发现元拓本存有356字，十四年拓本存310字，已少46字[1]。弘历在元拓本前写了"籀文神护"四字，于拓本后题七言一首："己巳拓藏石鼓辞，及存真迹弃珍之。讶观元代赵家印，重读唐时韩氏诗。居上后来宁避诮，为雄积健信称奇。收三百又加旬者，多四十还余六兹。节化智营二以外，文乎宣也古惟斯。商彝夏鼎方伯仲，片羽吉光永陆离。龙爪云中幻隐现，蚪文劫后尚留遗。渊明甚解不求处，向辟其言用此宜。癸卯仲春御题。"[2]

‹1› 据《石渠宝笈续编》页561，"元拓石鼓文"条。

‹2› 载《石渠宝笈续编》页580.。

书籍1.indb 151 12-5-31 下午4:49

诗中讲了校碑结果和韩愈诗的重要，指出石鼓是周宣王时物。诗结尾云“渊明甚解不求处，向闢其言用此宜。”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说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”是说对所读的书不执着于字句的讲解。弘历借陶渊明话说出石鼓的难读难解，还说出了对石鼓的难以释怀，意味着他与石鼓的对话仍会继续下去。

随从皇帝观碑的侍从有八位，即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，也都恭做诗跋。如刘墉诗(摘)：“岐阳石鼓，传二千年。依于宫墙，至今存焉。文或不蚀，其光煜然。夙登内府，如星在躔。帝庸作歌，岁唯己巳。谓兹法物，上征姬氏。兴贤为宝，训垂万祀。神护不毁，以彰古义。皇情睠之，见道于器。”‹1›这件元拓本石鼓早已遗失不知所在。如今故宫保存着乾隆时雕刻的一件碧玉册即癸卯御题诗。

三

乾隆五十四年已酉(1789)八月，弘历七十九岁，他再度关注石鼓文。关于石鼓刻石的时代，以往有几种说法：韦应物、韩愈、欧阳修以为周宣王时(前827～前782)；董逌、程大昌以为周成王时(前1042～前1021)；郑樵以为春秋战国之秦国(前770～前221)；陆发仁认为北朝元魏宣武帝时(502年)；马定国以为西魏北周宇文氏时(535～581)，等等。弘历则赞成周宣王时刻‹2›。关于十个鼓的排序历来也有分歧，弘历则主张以潘迪《石鼓音训》顺序为准。

同年十一、十二月弘历做了三件事：其一，按照潘迪的排序，调整了元拓石鼓文的前后次序。他摘韦应物《石鼓歌》内“喘息透迤相纠缠，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”十六字，分别写在十六叶之首以辨次第。其二，弘历为元拓本题诗并跋(见附录三)，与元拓本一起重新装裱，并把癸卯年写下校碑记录和和珅、刘墉八人跋与诗，也裱入册。其三，筹备重刻石鼓事宜，命赵秉冲为新石鼓写篆文。(赵秉冲篆文见弘历写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，制鼓重刻序》。)赵秉冲，乾隆四十七年(1782)钦赐举人，官户部右侍郎，书法四体皆精。

四

乾隆五十五年庚戌(1790年)，弘历八十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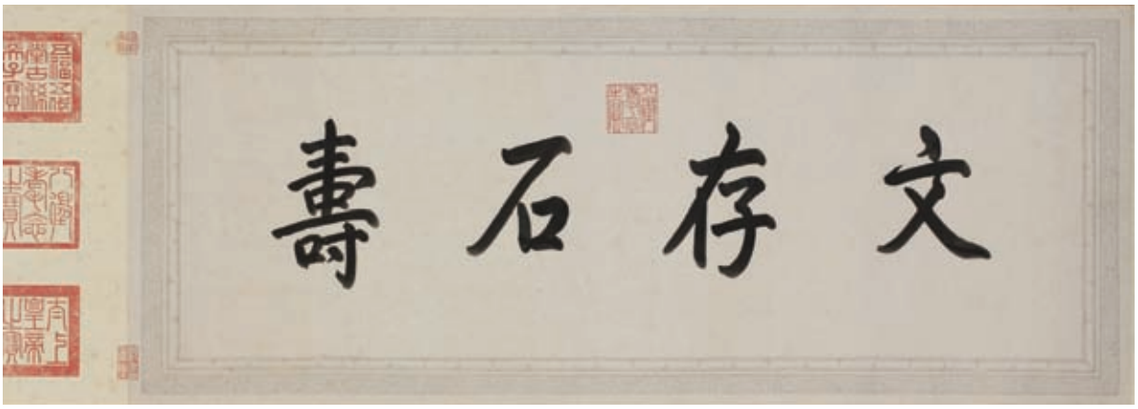
正月十日，进呈王澍(1668－1743)于雍正八年(1730)所临《石鼓文》。王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，官吏部员外郎。同时进呈汪由敦(1692－1758)乾隆四年(1739)所临《石鼓文》。汪是雍正二年

‹1› 见《石渠宝笈续编》“元拓石鼓文”条，页562。

‹2› 近代学者认为石鼓是东周时的秦国刻石。

书籍1.indb 152 12-5-31 下午4:49

〔图五〕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，制鼓重刻序》引首题字



〔图六〕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，制鼓重刻序》之一



〔图七〕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，制鼓重刻序》之二



进士，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这两件作品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正月十五日元霄节，弘历颁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，制鼓重刻序》，该序墨迹今存故宫〔图五、图六、图七〕。这篇序文有千余字，是弘历有关石鼓文字最长的一篇。分五层意思：（一）编四库全书和

书籍1.indb 153 12-5-31 下午4:49

满文译大藏经两件大事虽然举事已晚(在六十岁以后)，但现在终于成功了。(二)今石鼓已漫漶，存不及半，将来终归毁灭。有治世之责的君王，如果视之而弗救，那就不是读书人了。我在耄耋智昏之前，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。(三)韩愈讲石鼓是西周宣王时所刻，因为鼓文与《诗经·小雅》中《车攻》、《吉日》两首可以印证。他又认为石鼓宜置国学，成为万世读书人治学的门径。这些都正确。但是他还未考虑到将石鼓永远保存下去的事。(四)现在用石鼓所存310字，依照原来诗意，重编鼓文十章(弘历亲编首章与末章，其它八章由彭元瑞作)，命赵秉冲篆书镌刻于新鼓之鼓面。如此可以仍然保留周宣王之文，成十鼓之全，又非拘于形而泥于古。(五)旧鼓旧文为千古重器，不可轻动，但置木栅，蔽其风雨，珍重护惜，以永万世。(六)新鼓与旧鼓并列国子监以公天下，惠后儒。热河文庙为岁岁惠远诘武之地[1]，则亦命置之；以诏来世，使宣王中兴之烈不泯，宣圣牖世之道恒昭。(见附录四)这篇序文不仅综括了弘历对石鼓的考证，阐述“述古兴贤”、“述古传今”、“重道崇文”的思想，还确定了保护、重刻和异地放置石鼓的办法。新鼓移置热河，扩展了古物的价值。

正月十六日， 乾隆题《再题石鼓》(见附录五)，这首诗涉及石鼓中《作原》一鼓的沿革。该鼓在很早的时候被人凿去了一截，当中凹陷下去成了舂米的石臼。有一种说法，认为宋代司马池将石鼓从田野移到凤翔府学，当时《作原》鼓的原石已遗失。皇祐四年(1052)向传师留心寻访才在附近乡间找到，但已为人改凿成臼。也就是说《作原》一鼓在唐代发现时尚完整，后来遗失之后被凿成臼。弘历根据韩愈《石鼓歌》中已有“为我度量掘臼科”的话，认为《作原》鼓在唐代已成为舂米用的石臼，而不是当散失之后才改凿为石臼的。弘历又把自己的诗文《再题石鼓》书丹于《作原》鼓的口沿上并让人刻出来。

正月中旬，乾隆题《重排石鼓诗得句》(见附录六)。

二月，呈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长卷。乾隆诗题《观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长卷作歌》(见附录七)张照(1691－1745)，康熙四十八年进士，官吏部尚书。也是弘历的老师。

五月，重刻石鼓功毕，一式二套。一套仍置国子监大成门下〔图八、图九〕，另一套置热河避暑山庄文庙。同时将乾隆的制鼓重刻序与张照书韩愈石鼓歌分别刻作两碑，树立在石鼓旁边，以示典重，晓天下。

与此同时还为原刻石鼓增设屋檐和栅栏以蔽风雨，防损坏。

《清高宗实录》载，五月十六日(丙申)，“上诣热河文庙行礼，阅视新镌石鼓于戟门”。

乾隆五十六年辛亥(1791)，他着手布置重刻儒家经典十三经。此事到五十九年(1794)完成，190块石碑立于国子监直至今日。很显然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重排重刻石鼓正是重刻十三经的先导。

乾隆五十五年之后，未再见到乾隆为石鼓而写的诗文留下来。

‹1› 诘武：整治，训问武功。

书籍1.indb 154 12-5-31 下午4:49

〔图八〕国子监内乾隆重刻石鼓



〔图九〕国子监内乾隆重刻石鼓庚鼓拓本



五

在弘历看来，石鼓文是三代遗物，篆书之祖，其诗篇与《诗经》同体同时，讲的是周代礼乐，宣王中兴，理当视为文化传统与儒家道统的象征。乾隆所谓“千秋法物”、“重道崇文”即可由此理解。他对于石鼓文，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

自弘历三十九岁至八十岁，从开始的“吾愿兴贤得真宝”（自《石鼓歌》），到后来的“近因阅石鼓文，惜其岁久漫漶所存不及半。夫以国学兴贤述古之为，使千万年之后并此仅存者胥归无何有之乡，有治世之责者视之而弗救，予且不成为读书之人矣！斯事体大。”“非因难以见巧，实述古以传今”。（自《重排石鼓文序》）乾隆思想是前后衔接、深思熟虑的。两千年前所刻，一千年前发现的石鼓在乾隆时代独出机抒，成为提倡“述古兴贤”、“述古传今”、“重道崇文”和珍重护惜文物的的真宝与重器。

石鼓在乾隆之世的特别遭际已如上述[1]。

清初，顾炎武、朱彝尊的学术活动已经揭起了清代金石学的序幕，弘历会有所闻。然而弘历从即位初期组织翰林编撰《秘殿珠林》、《石渠宝笈》以系统著录历代书画，传拓考证石鼓文奉为千秋法物，著录、图绘内府鼎彝铜器编成《西清古鉴》等一连串举动，无不具有古典考证学的性质。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下，帝王的好恶影响朝野甚大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以石刻方面来说，至乾隆中期日见全盛，各地方访碑、搜集、编目、著录的普遍展开，保护金石的加强，实与乾隆的“兴贤述古”、“述古传今”的倡导相呼应。朝廷自上而下的推动和朝野间互动的作用，在清代古典考证学中是十分重要的原因。从《金石萃编》及其作者王昶即可看出倡导的影响。

王昶（1725－1806）乾隆十九年进士，官至刑部右侍郎。精于诗文，金石。嘉庆初编撰成《金石

‹1› 参见侯怡利《圣主明君的形塑与文物的再诠释——论乾隆重刻石鼓》，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27卷第4期，2010年。

书籍1.indb 155 12-5-31 下午4:49

萃编》一百六十卷为金石学经典著作。该书卷首列石鼓文。王昶在按语中说：石鼓“元明以来久列国学。乾隆五十五年，高宗纯皇帝临雍讲学，见石鼓原刻，惧其岁久漫漶，为立重栏以蔽风雨。别选贞石摹勒石鼓之文，俾海内士人便于椎拓。《御制重刻石鼓文序》从韩愈诗定为宣王时物。洋洋圣谟，昭示万古。臣昶仰蒙恩赉，得瞻全帙，诚熙世之隆规，艺林之盛事也。臣谨敬什袭藏诸家塾，爰以石鼓冠是书之首志荣遇焉。”按语讲“仰蒙恩赉得瞻全帙”是指五十五年元月十五日后见到了《御制重刻石鼓文序》的墨迹全卷，“什袭藏诸家塾”是指朝廷将墨迹摹勒刻碑之后的拓本颁赐大臣，王昶得到了一份。此事当为乾隆推动金石学有力的一个明证。

文存石寿。自乾隆十四年至今又二百六十年了。石鼓的元代拓本已不知下落。然而岐阳石鼓、十四年所拓石鼓文，癸卯御题诗碧玉册、御制重刻石鼓序墨迹及拓本都保存在故宫博物院，重刻石鼓仍置于北京国子监和承德文庙，王澍、汪由敦书石鼓文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它们共同见证了乾隆与石鼓的一段因缘和史事始末。

附录

本附录包括乾隆关于石鼓文的御制诗文的一部分和韩愈的《石鼓歌》。《石渠宝笈续编》采用上海古籍书店1988年影印本，《清高宗御制诗》采用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。

附录一：韩愈《石鼓歌》

张生手持石鼓文，劝我试作石鼓歌。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。
周纲陵迟四海沸，宣王愤起挥天戈。大开明堂受朝贺，诸侯剑佩鸣相磨。
蒐于岐阳骋雄俊，万里禽兽皆遮罗。镌功勒成告万世，凿石作鼓隳嵯峨。
从臣才艺咸第一，揀选撰刻留山阿。雨淋日炙野火燎，鬼物守护烦撝呵。
公从何处得纸本，毫发尽备无差讹。辞严义密读难晓，字体不类隶与蝌。
年深岂免有缺画，快剑斫断生蛟鼍。鸾翔凤翥众仙下，珊瑚碧树交枝柯。
金绳铁索锁钮壮，古鼎跃水龙腾梭。陋儒编《诗》不收入，《二雅》褊迫无委蛇。
孔子西行不到秦，掎摭星宿遗羲娥。嗟余好古生苦晚，对此涕泪双滂沱。
忆昔初蒙博士征，其年始改称元和。故人从军在右辅，为我度量掘臼科。
濯冠沐浴告祭酒，如此至宝存岂多。毡包席裹可立致，十鼓只载数骆驼。
荐诸太庙比郜鼎，光价岂止百倍过？圣恩若许留太学，诸生讲解得切磋。
观经鸿都尚填咽，坐见举国来奔波。剜苔剔藓露节角，安置妥帖平不颇。
大厦深檐与盖覆，经历久远期无佗。中朝大官老于事，讵肯感激徒嗟呵。
牧童敲火牛砺角，谁复着手为摩挲。日销月铄就埋没，六年西顾空吟哦。
羲之俗书趁姿媚，数纸尚可博白鹅。继周八代争战罢，无人收拾理则那。

书籍1.indb 156 12-5-31 下午4:49

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上论列，愿借辨口如悬河。
石鼓之歌止于此，呜呼吾意其蹉跎。

附录二：乾隆十四年拓石鼓文后题诗

石鼓歌

石鼓之数符天干，千秋法物世已少。况乎辟雍所罗列，多士藉以资搜讨。
韩苏杰作遥唱和，近者德潜诗亦好。濡笔将吟复屡停，蛇足今添笑绝倒。
昌黎建议虽不行，至竟如言见诚蚤。东坡寓意良独深，新法当时实滋扰。
德潜力欲追二公，横盘硬语抒文藻。或文或宣辨已纷，鑑鑑炅炅终莫考。
不独议礼如聚讼，千古訾黄率兹道。我命金石谱以来，观之参半不能晓。
四马六辔纵彷佛，云中如辨飞龙爪。点画音训费推寻，刻舟求剑识诚小。
忆昨幸鲁入宫墙，礼器惟见贻金卯。此鼓上欲埒鼎彝，存羊爱礼洵可表。
大观金填志郑重，金人辇至燕京肇。韩意其然岂其然，吾愿兴贤得真宝。

（见于故宫博物院藏木匣，另收入《清高宗御制诗》二集150页）

附录三：乾隆五十四年冬，再题元拓石鼓文

右元拓石鼓文，赵孟頫音释计十一叶。孟頫篆书，韦应物、韩愈、苏轼诗，周越识语二叶。又周伯温赋，顾文昭、卢原质、孙经、唐志淳、危素诗跋三叶，凡十六叶，并重订其次序。因摘韦诗内“喘息逶迤相纠错，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”十六字分书各叶之首以识次第。己酉冬月御笔。

周宣王猎碣十，今在太学戟门下。旁音训一碑，元国子司业潘迪撰，依施宿序次者也。岁己巳曾拓本，题长句，匣储乾清宫。越癸卯得此元拓本，赵孟頫音释，乃依薛尚功序次者也，复题长律，并命儒臣跋于后。兹几暇兼取旧藏太学者相校，则甲乙参互，检阅为艰。思折衷以定一是。夫石鼓之聚讼久矣！苏勖、窦泉、张怀瓘、韩愈、苏轼以为宣王鼓；韦应物以为文王鼓，宣王刻；董逌，程大昌以为成王鼓；郑樵以为秦鼓，马定国以为宇文周鼓。然自元至今，定为宣王鼓无异辞者。以“车攻”“马同”合于《小雅》故也，则“车既工，马既同”为第一鼓无疑矣。其下曰：“车既好，马既駢”即《小雅》之“田车既好，四牡孔阜”也。苏轼诗“我车既攻马亦同，其鱼维鱮贯之柳。”举第一第二鼓之文也。鼓在凤翔荒野，人方取为为臼，孰从整齐而行列之。宋在稽古阁，金在王宣抚宅，谁能摩挲而排比之。元皇庆始移国子监。至元间，潘迪作音训，孟頫在迪前，故取薛说。当南宋偏安，举中原而弃之。淳化阁帖购自榷場，定武兰亭辇归金府，薛、郑诸人徒于纸本想像，各以意为之，何如潘迪之亲见兹石为审也。因准迪所次，改订前后，并于孟頫注中标明，今定为第几鼓，俾石墨相符，校雠为易。不没其旧，不戾于今，斯善耳。石鼓三代法物，还取三代雅诗印之。况十鼓具存显显如是，薛、郑何取焉。即儒臣旧跋之叙而不断，亦泥也。不宁惟

书籍1.indb 157 12-5-31 下午4:49

是，事毋蓄疑，政贵崇实。仿井田封建之制，且取未见井田封建者，如刘歆、王安石所论说，以治天下，其可乎哉。已酉长至御笔重识。

（载《石渠宝笈续编》559－561页）

附录四：乾隆五十五年元月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》

本幅蜡笺本，二幅。前纵一尺一寸二分。横一丈一尺四寸。行书。

凡举大事者，必有其会与其时，而总赖昭明天贶以成其功。武成九次，无论矣。即如《四库全书》及以国书译汉藏经，皆始于六旬之后。（自癸巳年蒐辑海内遗书，并于永乐大典内，采辑散编，命馆臣依经史子集，督缮《四库全书》四分。又佛经本出厄讷特克，一译而为唐古特之番，再译而为震旦之汉。其蒙古经，即康熙及乾隆年，陆续译成。而来有国书之佛经，先于三十七年，亦命开馆译定。兹二事卷帙浩繁，俱非易于观成者，乃皆在予六旬始命举行，初亦不觉其迟也。）既而悔之，以为举事已晚，恐难观其成。越十余载，《四库全书》则早参考装潢毕，以贮之阁。而所译汉藏，兹亦将告毕就。此非天恩垂祐，俾予虽老而善成此二事乎。近因阅石鼓文，惜其岁久漫漶，所存不及半。夫以国学兴贤述古之为，使千万年之后，并此仅存者胥归无何有之乡。有治世之责者，视之而弗救，予且不成为读书之人矣！斯事体大。千古读书人所不能任，亦从无道及者，予故不怍不文，及此未至耄耋智昏，爰蒇此事。盖石鼓之为宣王时作。与夫宜置国学，为万世读书者之津逮。自以韩昌黎之见为正，车攻吉日之章，班班可考也。（后人议论纷出，如董逌、程大昌，据《左传》成有岐阳之蒐，以为成王鼓。郑樵据“殷盼”二字见秦斤秦权，以为秦鼓。马定国据《后周书》以为宇文鼓。陆友仁据《北史》以为元魏鼓。总不若韩愈之见为正。盖即本鼓之文，取证小雅，可信也。若欧阳修《集古录》云：韦应物以为文王鼓，宣王刻。今应物《石鼓歌》具存，明以为宣王，何曾有文王之说。近者尚悞，况与论三代以上哉）。夫昌黎有其见而无其力，且未思及存其诗。则予较昌黎为胜矣。兹用幸翰苑之例（乾隆九年，重修翰林院落成，新临锡宴。以张说《东壁图书府五律》四十字为韵，予赋东字及末音字二韵，其余敕诸臣各分一韵赋诗。）亲定首章，截其长以补后数章之短。即用文中字，并成末章。自第二至第九，命彭元瑞按余字各补成章。非因难以见巧，实述古以传今。于是石鼓之文仍在，十鼓井井有条而不紊矣。旧鼓旧文，为千古重器，不可轻动。但置木栅，蔽其风雨，以永万世。而新为十鼓，以刻十章，并列国学以公天下，惠后儒，则仍周宣王之文也。热河文庙为岁岁惠远诘武之地，则亦命置之，以诏来世，庶乎宣王中兴之烈不泯，宣圣牖世之道恒昭。而予及耄耋之年，尚得蔵此崇文之举，孰非会之萃时之合，深蒙昊贶之所致哉。希周家卜世之久，鬯皇清重道之规，后世子孙尚慎念之。是为序。

附录五：再题石鼓

石鼓韩歌掘臼科，弗知其意所云何。兹因考古十之质，爰命图真一有窠。

书籍1.indb 158 12-5-31 下午4:49

慨叹曾充舂杵用，伤形已阅岁年多。言行国学历珍弃，重道崇文功不磨。

命图十鼓形以来，漫漶缺裂，固数千百年物之常。其第十鼓平面则鑿为大孔，圆径一尺三寸，深一尺二寸，因恍悟即昌黎之所谓臼科也。科者坎，坎者陷，非俗所谓臼窠乎。则昌黎之语，乃举其实，而其为臼窠自唐时已然矣。呜呼！为此者实庸愚小人不足罪，兹虽珍重护惜，以永厥年，安知数千百年之后，不复遭剥蚀割鑿之灾乎。而重其文以成十鼓之全，又非拘于形而泥于古乎。其幸在兹，其慎亦在兹矣。庚戌正月上元后一日御笔。

附录六：重排石鼓诗得句

就石所有三百十字，分排十章，并鑿成十鼓，各泐其面。

十什排成十鼓咸，崇文漫议创非凡。就其本有差鳞次，弗以所无为雁谗。

潘氏（迪）详诠尚可取，杨家（慎）伪作概从芟。拈题既复赧然笑，那禁千年后削劖。庚戌新正月中澣御笔。

（以上载《石渠宝笈续编》1452－1456页）

附录七：乾隆五十五年，观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长卷作歌

昨近考订石鼓文，石鼓文纷不胫走。（近阅石鼓文，惜其所存不及半。更应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，因就所有三百十字集成十章。予亲定首章末章，其自第二至第九，命彭元瑞按余字各补成章，以述古而传今。于是，有以王澍、汪由敦所临石鼓文一再进呈者。

帝王所好可弗慎，讵增愧哉祇增靦。兹阅昌黎之本歌，益奇两出张生手。岂我独是韩之说（兹大学士和坤进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长卷。愈歌首句“张生手持石鼓文”，此卷复系照所书，亦一奇也。照学识素称渊懿，非徒工操翰者。观其手书此诗，神采飞舞，自必服膺昌黎。予序中以愈主周宣时之说为正，似照亦有同心也。）韩而有灵藉张剖。行以颜争坐位帖，笔不求佳勃勃酒。（《石渠宝笈》中藏照所临颜真卿争坐帖卷，高矮二本。又有节临直幅，乃其醉后所仿，无意求工而妙得天趣。其自跋中亦有“酒气勃勃十指间”语。）物必有双语信乎，长卷直幅贲四友。十鼓十什永周宣，数典韩张碑并寿。（旧有十鼓原立于太学戟门之内左右列，为之置栅以蔽风雨。今所集石鼓文十章亦命制石鼓，十镌其文，置于戟门外之左右。并以予所作序及新订音训别刊一碑，树于东楹。今拟于西楹刊予此歌，而以照所书韩诗刻于四周，以冀并寿贞珉云。）

（载《清高宗御制诗五集》53卷258页）

[作者单位：故宫博物院研究室]

（责任编辑：张　露）

书籍1.indb 159　12-5-31 下午4:49